

为改革声辩

魏 杰 著

21-53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漆 熠

责任校对：段健瑛

封面设计：卜建辰

电脑制作：卜建辰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贾志坚

为改革声辩

魏杰 著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出版社电话：62541886 发行部电话：62568479

经济科学出版社暨发行部地址：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100086

*

787×1092 毫米 32 开 12.75 印张 250000 字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058-1208-4/F·860 定价：15.2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改革声辩/魏杰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7

ISBN 7-5058-1208-4

I. 为… II. 魏… III. 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中国
-文集 IV. F27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642 号

写在前面的话

我的这本文集之所以称为《为改革声辩》，是因为文集中所收入的东西，要么是我在有关研讨会上的讲话，要么是我在有关报告会上的演讲，这些东西从内容上讲，都是与改革有关的，从形式上讲，都是首先用口讲出来的，然后通过录音或录像而整理成文的，口讲即声辩也，所以用了《为改革声辩》这个书名。

经济学家同普通人一样，在交流思想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工具，一个是笔，一个是口。人们通常讲的口诛笔伐，就是指人们在思想交锋中要综合使用这两件最基本的工具。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曾形象地称自己是口力劳动者，也就是指口是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工具。口和笔都很重要，因而这两个工具我都使用。尤其是口这个工具使用起来最为方便，成本也最低，

所以我经常使用它。用它在不少研讨会上发言，用它在不少报告会上演讲。听的人觉得很有意义，就录了音，录了像，而且还由录音或录像而变成文字。这些录音或录像的文字整理稿，有的被作为文章而发表，有的则被作为内部参考资料而传播。我非常感谢那些将我的口力劳动成果转化成为笔力劳动成果的人。但形成文字的发言稿或演讲稿，大部分都并未直接送我，都是我在偶然的发现或间接地得到的。久而久之，就有了不少这类文稿。闲来阅读时，自我感觉良好，发现这类文稿中的思想“火花”不少。这类文稿都是在无有稿子的条件下顺口而讲的，然后由别人根据录音或录像整理的，并未经过我加工修饰，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些文稿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的思想：写文字稿时，往往是千琢磨万考虑，写的过程中首先是要考虑到哪些话不能讲，哪些话要讲得圆滑些，总之是要将自己包装起来，因而写成的稿就往往是无棱无角，甚至会把真实想法埋藏起来；但顺口而讲就没有机会考虑了，顾虑许多，往往是在环境与情绪的影响下，毫无修饰地脱口而出，真实思想一下子就通了出来，因而“火花”往往多一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

我感到将这些东西出版出来会有一定的意义。再加之它是口语化的，又都是一些大白话，无有理论语言的修饰，因而非常适合大众阅读。

人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句话非常正确，尤其是对祸从口出，我有深切的体会。我这个人不会包装自己，尤其是爱讲一些真话，总感到自己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也不是为自己的任何私利，为什么不讲真话？结果是祸从口出。我总感到自己凭本事吃饭，不求助于人，而且自以为讲什么话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因而往往不注意处理各种关系，不注意讲话的方式，结果是常常遭到非议。我这里所讲的祸，主要是指我们遭受的一些“左”祸。在实践中我深深感到，任何超前的理论创新，对于创新者来说，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创新者要遭到那些“左”派人物的非议及诬告，这种非议及诬告常常会影响到创新者的提职及晋升。但当实践证明创新者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已变成国家政策时，并没有人去给创新者“平反”。1994年初我就提出，国有企业不仅要加快改革，而且还要注重租、变、卖、送，通过各种方式彻底放活那些中小企业。这个提法当时就被几

个人扣上私有化的帽子而大加批判。但后来的中、小企业改革恰恰正是按照这个路子而放活中小企业的，而且实践也证明这个路子是切实可行的，并不是什么私有化，而是那几个批判人的人将非国有化与私有化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混淆了。我也不知道对我大加批判的人，在实践面前现在有何感想。

1995年初，我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个体及私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贡献已很大，而且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及税收，他们也应该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没有想到这段话引起了个别同志的极大“愤怒”，认为这就是鼓吹私有化，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老调重谈。我不知道，这几位同志当看到那些在夏天的烈日下，在冬季的寒风中，整日辛勤劳作的以小贩为生的个体人员时，有何感想。我想，这些以小贩为生的人恐怕不是不想进入政府或国有制大企业，而是政府或国有制大企业没有就业机会给他们，他们是在自己为自己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依靠政府为他们安排就业，这实际上是在为政府分忧。如果认为这些人连国家的基础都不是，那么不从其他角度去讲，就

是只从人的感情上讲，恐怕也属于无情无义之列。

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年代，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用新的观念去看问题，切不可逆潮流而行。我将永远用革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市场化进程中需要不断讨论的两个问题	(1)
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	(33)
市场化进程中易于出现的问题	(74)
名牌现象的经济学思考	(144)
名牌发展的制度基础	(164)
长虹经验：企业家的驱动与名牌的自觉追求	(184)
王朝经验：在合资中发展自我	(211)
三九集团成功的基础：全方位创新	(233)
“椰风”经验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250)
国有企业改革的四个层次	(264)
民营企业的困境和未来	(272)
关于西部发展的几个问题	(317)
外资进入中国大陆趋向的分析	(375)

市场化进程中需要 不断讨论的两个问题^①

市场经济问题，从 1979 年在我国就开始争论，一直到今年的十四大将其确定为我们的改革目标，前后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围绕市场经济问题，讨论来讨论去，不外乎四个问题：第一中国到底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如果要搞，那么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要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在确定了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之后，随之而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怎样搞市场经济？在明确了怎样搞市场经济之后，第四个问题就是怎样解决搞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对于这四个问题，可以说十四大报告以及后来相继出台的有关市场经济改革的文件及决定，都作了明确的

^① 这是我 1992 年 11 月 27 日在国家机关工委所作的报告的录音整理稿。

阐述，因而看上去似乎这四个问题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实际上这四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没有根本解决的重要表现，就是不少人不能正确理解建立市场经济过程出现的问题。一些同志找我谈：你看看现在，你骗我、我骗你，腐败问题，纵容拜金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我们过去不搞市场经济哪有这些东西出来。从这里我就发现，人们对市场经济还有个正确理解的问题。市场经济，不是要求人们腐败，要求人们搞拜金主义，也不是要人们坑诓拐骗。它仅仅是讲这样一个行为，就是每个企业在社会中要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每一个人也要提供产品或服务，而且他提供的这个产品或服务社会必须需要，要高效益地提供。谁能为社会提供社会需要的高效益产品或服务，谁在社会的地位就高。所以，每一个企业都必须不断地完善、发展自己，只有提供出社会需要的而且效益很高的产品或服务，你这个企业才能站得住脚。每个人也只有为社会提供高质量、高效益的产品或服务，你这个人才能被社会所认可。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要求每个人、每个企业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激励机制，所以我们才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既然是一种激励机制，那么它给你提供什么呢？机会。机会，谁都可以去选择，至于选择之后人的能力的差距它不承认，所以，最后的结果才会出现差别。有差别，大家就会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整个社会就进步了。市场经济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认识肤浅，把

市场化进程中需要不断讨论的两个问题

市场经济搞得很庸俗。一会儿说“跳蚤”市场是市场经济，所以要大力发展“跳蚤”市场。实际上，“跳蚤”市场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越搞市场经济就越不要“跳蚤”市场，但是我们的报纸却宣传它。一会儿又说教授卖馅饼是市场经济，第二职业也是市场经济，搞得乱七八糟。搞来搞去把对市场经济的正确理解搞没了，不是市场经济的一些东西都被提出来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自身造成的，而是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出现的。所以，在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对于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信念来说，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经济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一些同志对市场经济发生了动摇，好像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必要重新探讨这样四个似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怎样搞市场经济？如何解决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今天我要同大家探讨的是前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

对于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界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认识过程。因为，在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长期、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可以划分为两大派别。即：一方认为中国不能搞市

场经济，我称之为“反对派”；另一方则针锋相对，认为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我称之为“市场派”。争论的双方各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并在相互讨论中力陈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认为在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反动派”主要理由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在谈到未来“自由人联合体”时，设计了一个非商品化的、完全由计划调节的经济模式——“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① 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描述得更为具体：“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② 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市场化进程中需要不断讨论的两个问题

治也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 列宁也认为：“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② 总之，在马恩等经典作家看来，商品货币关系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高度发达阶段，商品、市场关系充分发展，货币成为资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范畴。当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政权之后，就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占有和分配生产资料，商品货币关系将被消除，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将由直接计划加以调节。因而也就从理论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利用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可能性。

第二，西方经济学家的论述。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否定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角度出发，从而排除了社会主义存在市场及利用市场机制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利用市场机制作用的“大论战”中明确提出：没有市场就不可能有合理的价格，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而没有私人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也就不可能有私人企业较以成功的自由创造和个人责任。哈耶克则更直接了当地提出：“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第545页。

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显然，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也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有内在必然联系的统一物。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贬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商品经济是一种利己经济，商人“见利忘义”，这与社会一般公共道德观念不相容。在传统的道德标准中，“礼义为上”，人的行为应恪守“修身、克己、报国”和“君子重义而轻利”的道德规范，讲求集体和国家利益，否认对个人利益的正当追求。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士、农、工、商”，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人，不仅是封建等级制度中低人一等的职业，而且认为“无奸不商”、“为富不仁”，商人都是损人利己的，是通过对别人的欺诈、盘剥而致富的。《康熙字典》中，居然把“商人”定义为“杀人者也”。当封建统治地位摇摇欲坠，社会风气、道德水准沦丧、堕落时，他们认为是“铜臭渐长”才导致“世风日下”的。

第四，认为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搞市场经济是另有图谋。从理论上断定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相联的制度范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要求中国搞市场经济，很显然是想把市场经济这一制度范畴强行塞进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一要求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而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其实质是西方资产阶级企图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手段，利用在商品经济交往中的物质利益诱惑等“糖衣炮弹”，以图“和平演变”战略

的一种经济手段。很明显，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不仅不能搞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反对市场经济。

第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市场不是万能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了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如经济危机的发生，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的分配使用上的无效性等。同时，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局部和短期调节，具有自身的弱点和功能缺陷，因而市场调节并非是无损耗的调节。市场在对社会资源配置发挥其调节作用时，会伴随着对社会资源一定程度上的损失浪费，有时甚至是巨大的社会难以承受的损失浪费，从而会导致经济生活的失衡和混乱。既然市场经济有这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那么，搞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也就没有多少了。

在对市场经济理论认识发展的相当长时期内，“反对派”及其理论观点是很有“市场”的，一直被视为理论发展的主流和正宗的观点，并在双方的争论中占了上峰，始终处于统治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随着政治“大气候”的改善，“市场派”才得以“翻身”，其理论观点得到承认和宣传，并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市场派”一直针锋相对地与“反对派”展开激烈的讨论，即使是在学术研究环境较为困难的条件下，也能针对“反对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在中国必须搞市

场经济的理论依据。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认为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制度范畴，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讲，任何社会都面临着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如何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要想达到社会效率最高和消费者、厂商及社会利益的最大满足，因而就必须选择一种使资源用于生产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组合、把资源配置于生产效率最高的使用者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较之于其他配置方式而言，市场经济具有灵敏反映供求关系、较快实现供求平衡、减少资源浪费，有利于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及产品结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新、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而它是与社会分工及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相联系的一种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最大程度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因为，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必须满足每个成员的各种需要，而且应以最低成本来满足，这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的活动效率最高、贡献最大，这是检验社会经济活动有效性的根本标准，而市场经济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有效联结社会供求关系的基础的手段，选择市场经济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同的必然结果。显然，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一样，是不从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

第二，需要对经典作家及西方学者的论述进行再认